

目录

总主编的话	i
前言	vii

第一章 绪论	1
--------	---

1.1 研究缘起	1
1.2 研究目标	5
1.2.1 学理目标	7
1.2.2 现实目标	8
1.3 研究方法	9
1.4 内容结构	10

第二章 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概述	13
-----------------	----

2.1 “中央文献”的概念界定	14
2.2 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成果要览	15
2.2.1 起步期（1921—1949）	16
2.2.2 第一次高潮（1949—1977）	18
2.2.3 稳步发展期（1978—2012）	21
2.2.4 整体推进期（2012年至今）	24
2.3 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研究综述	29
2.3.1 过程研究	31

2.3.2	产品研究	37
2.3.3	功能研究	44
2.3.4	理论研究	49
2.4	小结	58
第三章 中央文献译介研究		61
<hr/>		
3.1	译介主体研究	61
3.1.1	译介主体的界定	62
3.1.2	业界专业译者视角的研究	64
3.1.3	学界研究者视角的研究	71
3.2	译介内容研究	76
3.2.1	术语翻译	76
3.2.2	用典翻译	81
3.2.3	隐喻翻译	86
3.3	译介过程研究	89
3.3.1	译介的宏观过程	89
3.3.2	译介的中观过程	96
3.3.3	译介的微观过程	100
3.4	译介社会/文化语境研究	102
3.4.1	译介的社会因素	103
3.4.2	译介的历史因素	106
3.4.3	译介的文化因素	107
3.5	小结	109
第四章 中央文献传播研究		111
<hr/>		
4.1	传播主体研究	112
4.1.1	传播主体的三维结构	112

4.1.2	传播主体的主要特征·····	118
4.2	传播渠道研究·····	122
4.2.1	传播渠道的现状·····	123
4.2.2	传播渠道的优化策略·····	128
4.3	传播受众研究·····	132
4.3.1	英语世界的受众传播·····	133
4.3.2	非英语世界的受众传播·····	138
4.4	传播效果研究·····	143
4.4.1	媒体传播效果·····	146
4.4.2	馆藏传播效果·····	150
4.4.3	读者传播效果·····	152
4.5	小结·····	155
 第五章 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个案研究		156
<hr/>		
5.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用典英译·····	157
5.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原文本用典特征·····	159
5.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用典英译策略·····	162
5.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用典英译与国际传播·····	170
5.2	《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隐喻英译与中国共产党形象 塑造·····	173
5.2.1	翻译、话语与形象·····	174
5.2.2	隐喻翻译的形象建构功能·····	178
5.2.3	以《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隐喻英译塑造中国 共产党形象·····	182
5.3	《政府工作报告》的特色语汇英译·····	190
5.3.1	《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特色语汇的定义与分类·····	191
5.3.2	《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特色语汇的特点与英译 策略·····	194

5.3.3	《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特色语汇英译策略的影响 因素·····	205
5.4	小结·····	207
第六章 结语		209
<hr/>		
6.1	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总结与反思·····	209
6.2	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趋势与展望·····	214
参考文献		221
<hr/>		

1.1 研究缘起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的，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赢取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硬实力，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中国话语在对外译介与传播过程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选择，以及各种话语变量在此过程中的协调与配合（杨枫 2022）。因此，如何实现“中国知识”和“中国智慧”的世界表达与阐释（魏向清、杨平 2019），如何切实有效地助力提升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翻译与国际传播工作者的职责和历史使命。

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与我国综合国

1 参见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zhuanku/2021-06/02/c_1127522386.htm。

力相匹配的对外话语体系，进而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基础和核心要素，并基于这一判断做出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从而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重大决策部署。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²。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³。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

1 参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10/c1001-23144775.html>。

2 参见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19/c64094-28361550.html>。

3 参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602/c1024-32119745.html>。

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在“七个着力”重要要求中，提出“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些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决策的前瞻性和延续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百年大党，让世界“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中国”¹。而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需要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及其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中央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成果和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其内容多涉及我党执政思想、意识形态、政策方针以及国家社会建设、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与成就，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阐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主张以及治国理念精髓，体现党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语言严谨、行文规范、思想丰富、逻辑缜密、理论性强，具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因此，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理念、政策和成就的重要途径，在让世界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中国国情方面发挥着基础与引领作用，也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传播方面发挥着导向和示范作用。

具体来说，中央文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对党的建设、国家发展和世界形势等重大问题的深刻分析和科学论断，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党、政府、民间组织和广大人民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凝聚着党和国家

1 参见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2-06/30/nw.D110000renmrb_20220630_3-01.htm。

的历史记忆、现实经验和未来愿景。中央文献作为我国政治思想权威表述和全党上下集体智慧结晶的一种特殊政治文献，其系统化和规范化译介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全面传播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路，有助于向国际社会传播规范、准确的中国特色表达，亦有助于增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 and 交流，更好地使国际社会熟悉和认可中国话语体系。中央文献国际传播的主要受众是对象国的政治家、党派人士、社会精英和学术研究人员等，他们在特定社会中充当着“公共舆论领袖”的角色，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动向，甚至对所在国的政治动向和社会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传播策略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获得这一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认同。此外，中央文献的目标受众还包括在客观上需要了解中国现状和发展实际的人群，以及对中国感兴趣的群体（张生祥 2019）。

在新形势下，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工作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在译介内容与层次、译介策略与方法、译介模式与媒介以及译介主体与途径等方面（陈大亮 2021）均面临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因而对译者和译事也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究其原因，中央文献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宣翻译”，具备一定的特殊性。由于中央文献往往涉及较多政治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翻译质量事关党和国家以及政府、领导人的形象，在翻译时需坚守政治底线，严格政治把关，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内容，体现作者的思想意志，力求原汁原味再现原作形式、风格和思想精髓。由是观之，中央文献的翻译工作极具挑战性，同时考验译者的政治素养和翻译功底。如何在忠实性与可接受性之间进行取舍、在国家利益与国际期待之间综合考量、在政治原则和受众需求之间寻求平衡，使中央文献翻译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

都是中央文献译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贾一村 2020）。换言之，译者要“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¹。因此，如何在译介中从主体、内容、过程和社会/文化语境等方面准确把握中央文献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实质，如何在传播主体、渠道、受众和效果等维度有效地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如何有效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媒体平台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和期待，如何有效地评估和提升译介与传播的效果以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噪声”，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本书基于对以上宏观语境和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对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在对现有研究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尝试从学理层面对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实践和研究提出建议，以期有效改善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效果，拓展研究视域，推动此领域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

1.2 研究目标

本书所称“译介”，含“翻译”“推介”双重含义，与谢天振（2015）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交汇和接壤”的“译介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差别。相似之处在于两者均关注文本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传播和接受等问题，本质差别主要体现在译介学更为关注文学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行为的缘起、传播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且译介学理论的立足点是“创造性叛逆”，而这一概念与中央文献政治性、权威性和严肃性的特点并不相适应。

在本书中，“译介”这一概念中的“翻译”是将中央文献的原

1 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26/c_1123330490.htm。

文内容转化为目标语言的过程，是实现跨语言和跨文化传播的开端，而“推介”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宣传、解释和推广中央文献的内容和价值，以扩大中央文献的影响范围；“传播”是信息的对外共享和交流，是使中央文献国际传播的主体和客体通过互动和影响而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央文献的译介与传播密切相连、缺一不可：译介是传播的起点和手段，传播是译介的目标，而传播效果提升又会提升译介的质量。质言之，两者内在关联、多维互动、辩证统一。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文献译介”这一主题中的“文献”仅仅限于书面语材料，因而口译（如两会期间总理的记者招待会的现场交替传译）不属于本书的研究范畴；同时，本书中所指的“译介”仅指语际翻译，而语内翻译（从汉语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和符际翻译（非语言符号的翻译）也不属于本书所要研究的范畴；本书中所指的“传播”指中央文献的国际传播，即在英语世界和非英语世界的传播。在国际话语权仍受西方影响情况下，中央文献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翻译为目标语言，方能被国际社会广泛读懂、认知，因而本书所探讨的中央文献译介是以国家作为主体的一种译出行为（输出型翻译），即是“由中国政府、相关机构或译者主导、主动进行的中译外行为”（许多、许钧 2019），而由汉学家主导的以西方译者为主的中央文献翻译行为虽然也在讨论范围之内，但这并不改变中央文献译出行为的本质。

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是国家话语的国际化研究与实践工程，它经历了一个在探索中不断健全的制度化过程，以及从无序到有序、从分散尝试到统一规范的过程（张生祥 2019）。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文献已被译介成多种文字，经多种渠道传播到世界各地，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工作更是取得了长足发展。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工作更加强调战略和规划，更加注重质量和效果，更加突出特色和创新，更加体现开放和包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力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在推动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值得借鉴的丰富经验。与此同时，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工作也将继续迈上新的台阶，为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本书关注中央文献译介和传播两个维度，确定学理和现实两个层面的研究目标。

1.2.1 学理目标

第一，拓宽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研究视域。我们认为，对于中央文献翻译的研究，既要关注语言层面的转换问题，探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以及如何做到忠实于原文，也要考察语言背后的其他因素，而理论研究是理解翻译现象、掌握翻译规律、提高翻译能力和塑造自身形象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研究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宽。本书力图融合多种方法与理论，从学理层面解读中央文献译介的全过程及其受众所处的社会、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从而推动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更好地服务于中央文献翻译的相关研究工作。

第二，提供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可观察、可描述、可分析的研究框架。目前，对于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方面仍有改进空间，亟须在操作层面上建立可作为有效抓手的

研究框架和分析维度。有鉴于此，本书通过对“译介”与“传播”两个概念展开渐进审视，从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基本特征、影响要素与根本诉求出发，展开理性思考和客观评价。通过这种方式，使中央文献在文本层面和非文本层面的研究均有据可考、有理可依，成为可观察、可描述、可分析的研究对象，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

1.2.2 现实目标

第一，为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作为一种译出行为，中央文献翻译与译入行为有着较大差异。译入过程一般建立在目标语国家对译入文本有着强烈需求的基础上，因此从事译入活动的译者所需考虑的问题，仅仅是如何将文本译得准确、通顺。以中央文献翻译为代表的译出行为则不一定符合他国的内在需求，由此就会产生许多制约和影响译介活动成败得失的因素。本书紧密结合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现实境况，探讨中央文献的译介特点和译介原则，提出适合中央文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提高其翻译质量和水平，并从传播角度，立足中国国情，挖掘中央文献的国际传播逻辑和传播机制，勾勒适合中央文献的国际传播模式和传播策略，以增强其国际传播的效果和影响。

第二，为国家相关部门和机构开展外译和传播实践提供建设性反馈。本书的研究成果不仅关注当前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迫切需求，还考虑到未来这一领域在对外译介与传播中的历时变化和动态发展。一方面，这些成果将有助于国家翻译机构正确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诸多现象与问题，为思考我国政治理念如何获得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提供研究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成果也

将有助于党和国家的中央文献原本生产机构从译介与传播的外部视角审视文本特征，从而为内容选取和语言表述等提供有益借鉴。与此同时，本书也将为中央文献之外的其他“逆向”译介与传播活动提供决策参考，并以此推动翻译和国际传播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3 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跨学科、多理论的原则阐释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现象和规律，有机融合理论与实践，既有宏观的整体研究，也有微观的个案分析，通过共时与历时互补、定性与定量并重的手段多角度、多层次地剖析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底层运作机制和内外影响因素。任何一种具体行为都有其主体、对象、过程、方法、结果、效果等要素，综合形成该行为特征。因此，本书从体系化视角，通过对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过程中的上述要素进行全面考察，遵循“现象—效果—启示”的分析范式，形成体系化的研究。首先，界定中央文献的内涵和外延，历时梳理其译介与传播实践活动的阶段特征和学术研究的差异化视角；其次，借助翻译学、传播学等理论，在语言现象的微观层面和社会文化的宏观层面探究中央文献翻译过程中的不同范畴，并考察中央文献在目标语国家的认知和接受现状，揭示不同要素与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复杂互动关系，总结中央文献译介的影响因素和普遍规律，梳理中央文献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以改善和提升其国际传播的现实效果；再次，采用再语境化、形象建构等理论视角以及语料库实证研究手段，选取中央文献典型案例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最后，对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实践和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尤其是对人工智能技

术与中央文献翻译实践和研究的结合进行前瞻性展望。本书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通过搜集、整理和分析国内外与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相关的经典译著、学术专著、期刊论文、新闻报道等文献资料，以文献研究和述评的方式，归纳研究主题和方法，形成知识体系，以呈现本领域的历史与现状。一方面，形成对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较为全面的认识，从现有研究中发现、提出问题；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本书的研究对象，有助于对研究内容充分地加以论证。

(2) 归纳与演绎研究法。基于翻译学和传播学等理论探究翻译个案，描写和解释中央文献翻译的具体语言现象和文本特征，并从现象到本质归纳译介与传播的一般指导原则和操作对策；同时，针对中央文献翻译效果提升，提出适用于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演绎性假设，为个案分析构建理论依据；通过归纳演绎的综合运用，为探讨译者翻译决策和语言选择对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影响提供案例支撑，为挖掘目标语受众对译文的理解和接受提供学理依据。

(3) 定性与定量研究法。首先，采用定性研究法界定中央文献的内涵，深化对其概念的理解，并通过理论思辨和案例分析，探讨当前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现状，寻找其规律。在此基础上，运用 AntConc、CUC_ParaConc 等语料库检索软件，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中央文献的翻译方法，对已形成的理性认识进行量化补充，提升研究信度和效度，进而对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进行分析总结和趋势展望。

1.4 内容结构

本书共分为六章，围绕中央文献的译介与传播，梳理脉络、总

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并展望未来发展，以期为中央文献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参考与借鉴。以下是每一章的具体内容介绍。

第一章总览本书的研究缘起、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首先从宏观语境切入，阐释研究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起因，探讨此领域的研究意义和价值，随后明确本研究的学理目标和现实目标，最后介绍本书所采用的三种研究方法，以保证本研究的学术性、合理性和可靠性。

第二章系统阐述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现状。首先对“中央文献”进行概念界定，明确其研究范围和对象。随后，从实践维度回顾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发展历程，从起步期、第一次高潮、稳步发展期和整体推进期展示其演变的脉络和阶段性特点。接下来从研究维度梳理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研究现状，以过程研究、产品研究、功能研究和理论研究为述评框架，力求全面直观地呈现当前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实践和研究的全貌。

第三章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过程和译介社会/文化语境等四个方面聚焦中央文献的译介。译介主体的研究主要包括译介主体的界定、业界专业译者视角的探讨和学界研究者视角的探讨，将从事实践与理论的主体进行有机融合；译介内容的研究主要包括术语翻译、用典翻译和隐喻翻译，处理好这些语言现象是中央文献更好“走出去”的关键所在；在译介过程研究方面，从宏观整体、中观局部和微观细节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全面深入地论述译介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最后解读译介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译介的社会因素、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挖掘译介背景、动因和效果。

第四章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四个方面考察中央文献国际传播。传播主体研究着眼于中央文献国际传播国家主体、机构主体和译者主体三个维度，聚焦其表现的共性和个

性特征以及传播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传播渠道研究关注中央文献的国际传播渠道现状，并总结优化国际传播渠道的策略。传播受众研究主要从英语世界的受众传播及非英语世界的受众传播入手，探讨不同受众在心理预设、意识形态、读者需求以及阅读喜好和接受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助力中央文献国际传播和话语体系建设。传播效果研究从媒体传播效果、馆藏传播效果以及读者传播效果三个方面切入，研究中央文献国际传播对受众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

第五章是本书个案研究部分，聚焦分析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用典英译、《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的隐喻英译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特色语汇英译。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深刻剖析和总结，展示了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其在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冲突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第六章概括本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贡献，总结研究意义和研究局限，反思研究问题和不足。同时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飞速发展，为新时代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做出前瞻性规划展望，提出策略和建议，为该领域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借鉴。